

非正规经济视角下地摊3.0活动与城市空间互动机制研究

刘卿云 王伟强

提 要 城市公共空间及其中发生的经济活动是城市活力、社会包容性和空间再生产的重要主体。在我国城镇化下半场人们需求和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化和多层次、精细化和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规划和城市设计趋势,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经济活力降低和就业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提升经济韧性、激发社会创造力和重塑公共空间活力成为关键议题。以疫情后在国家和地方政策鼓励下上海市形成的55个集市为研究对象,提出地摊3.0,结合历史演变和政策分析反思“谁决定”和“对于谁”的“正规”及其对立面“非正规”二元性。结合城市空间塑造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功能—空间—制度理论模型,在实地调研和绘制图谱关系等传统城市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利用多元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分析技术,探索地摊3.0与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机制,提出对公共空间更新的启示。

关键词 非正规经济;地摊3.0;公共空间;功能关系;空间关系;制度关系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ctivities of Temporary Street Market 3.0 and Urban Public Space: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l Economy

LIU Qingyun, WANG Weiqiang

Abstract: Urban public space and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that take place in it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urban vitality, social inclusiveness, and spatial reproduction. China has entered a more mature stage of urbanization in which plurality is exhibited in the needs and lifestyles of urban residents. In the context of sophisticated public service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and post-Covid-19 decline in economic vitality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enhancing economic resilience, stimulating social creativity, and reshaping the vitality of public spaces have become essential issu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55 temporary street markets formed after the covid pandemic in Shanghai that were encouraged by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It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emporary street market 3.0 through reflecting on the duality of 'formality' and 'informality' and asking the questions of 'who decides' and 'for who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space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synthesis of space theories and actor-network-theory, the paper develops a functional-spatial-institutional theoretical model. By integrating multiple data sources, GIS, and traditional urban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fieldwork and mapping, the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mporary street market 3.0 and urban spac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or regenerating the urban public space.

Keywords: informal economy; temporary street market 3.0; public space; functional interaction; spatial interaction;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61/j.upf.202303004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3)03-0027-11

1 地摊3.0,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

城市或城市社会是社会实践的一个维度,是日常居民生活、全球社会进程以及国家战略相互作用的产物^[1]。疫情后为促进经济复苏、缓解就业压力,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发布和调整了包括《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等政策文件,提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合理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等文件在提出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的同时,关注精细化治理和社区生活圈的构建^[2],体现了城市战略与完善社区的公共服务、塑造有归属感的社区公共空间不可分割。

“非正规经济”的概念由经济人类学家哈特首先提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19年的定义,非正规经济包含了一系列不受社会福利保护的工作和经济活动,区别于非法经济

作者简介

刘卿云,上海市上规院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助理规划师, qingyun.liu.1@outlook.com

王伟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通信作者, wwq@tongji.edu.cn

或隐形经济，虽然在体制之外但是从法律范畴来看是合法的^[3]，其提供的产品确实为社会所需又无害于社会。在城市发展不同阶段，非正规经济的形式从地摊、流动摊贩到“破墙开店”、各类集市，当政府需要解决就业等民生问题时，地摊等非正规经济被允许和鼓励，但是当其发展逐渐脱离政府掌控，对城市环境卫生、其他主体产生影响或不符合当前规划时，政府又会对其限制甚至禁止。正是其易变不稳定、缺乏组织、不易管理等特征让其成为“正规”的对立面“非正规”经济，然而这二元性是否绝对？在谁的权力^[4]和哪些主体的利益影响下决定了正规和非正规，而这二元性又如何影响了哪些主体？

中国进入城镇化“下半场”，随着城市居民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和多层次，从消费物品本身到消费其代表的社会等级和身份符号价值^[5]，满足不同收入群体需求的差异化供给成为城市品质生活的重要命题，考虑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应包容城市的不足^[6]。非正规经济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对经济和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弥补正规商业的不足，保障就业、缓解社会压力^[7]，成为社会震荡的缓冲器^[8]。另外，定量方法与多源数据的出现为非正规经济载体等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提供更多思路，如回归模型讨论影响因素^[9]，运用兴趣点（POI）、路网数据探索道路出行潜力^[10]等。针对新时代地摊的特征与作用，本文将中国城镇化下半场和疫情后在国家政策鼓励下公共空间中出现的非正规经济活动称为地摊3.0（表1）。以疫情后“夜上海潮流集市节”中集市为基础，结合实地调研和后续集市事件补充，共计55个集市（表2）为研究对象，将传统城市研究方法结合多元数据，对地摊3.0活动与城市功能和空间如何相互影响，及其价值进行研究。

2 承载地摊3.0的空间与地摊3.0塑造的空间

2.1 新时期上海地摊3.0总体空间分布和功能特征

空间分布上，55个集市主要分布在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杨浦区和虹口区。其中：27个位于内环线范围内，

表1 地摊1.0—3.0发展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temporary street markets from 1.0 to 3.0

分类	地摊1.0	地摊2.0	地摊3.0
时间	1980s—1990s	2000s—2010s	2020—
产生背景	政府关注解决“文革”后知青返城、农民进城的就业问题；加强城市管理设立城管部门，更加重视城市美观和秩序	上海提出“4050工程”，鼓励正规部门为找工作困难的40岁以上的女性、50岁以上的男性创造非正规、灵活就业机会；为提升城市风貌，“一刀切”拆违，整治“破墙开洞”店铺	政府发布《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住建部向其他地区转发《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的通知》
内涵	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	从商品交换到文化艺术的新经济形式，从环境美观到促进多元行为持续生长的城市拼贴共存方式，从单体优化到包容各类行动者的城市更新视角
政府态度	鼓励摆摊、开杂货店等以促进就业	禁止地摊、流动摊贩以提升城市风貌	鼓励地摊经济解决就业问题、提升经济和城市活力
形式	摊贩将货品堆放地面或推车售卖	政府划定棚区集市和批发市场，规定售卖时间	多样化的摊位、汽车后备箱等，周末、节假日在城市公共空间进行
功能	商品售卖	商品售卖	商品售卖、餐饮休闲、艺术表演、文化教育

占集市总数的49%；43个位于外环线范围内，占集市总数的78%。大部分集市都位于中央活动区的商业办公区，部分分布在居住区、历史文化风貌区，以及村镇区域等，如成嘉广场后备箱集市、思南公馆集市、金山嘴渔村夜市。见图1。

总体功能特征方面，上海地摊3.0主要包括商品售卖、餐饮休闲、艺术表演和文化教育等功能。商品售卖的商品种类涉及手工艺品、服装、植物花卉、宠物等，摊主售卖目的包括增加网店收益、扩大顾客网络、为实体店铺选址和产品推广进行市场调研，以及特色文化传承。餐饮休闲的种类包括各地特色小吃、咖啡啤酒、节日传统食品等，其空间构成要素包括作为摊主和顾客主要交互场所的售卖窗口，位于集市主要流线背面、相对消极的后勤空间，以及顾客的停留休憩空间。艺术表演一般位于集市中心或两端，大多结合餐饮休闲区布局，空间形式主要有结合标志物设置舞台、结合休闲区构筑物围合、通过艺术家表演吸引人群围合形成“瞬时”舞台等3类；表演形式包括乐队演唱、民间艺术家演奏以及结合周边建筑的互动。文化教育主要有4种类型：对周边历史建筑的宣传教育、对民间传统技艺的传承、对文化艺术的普及和对最新科技的展示体验；不同类型的空间形式有所差异，包括普通摊位的文化展示，有桌椅或特殊装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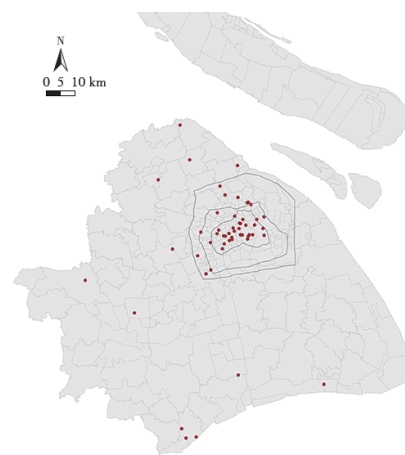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地摊3.0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emporary street market 3.0 in Shanghai

形成聚集较多人停留的广场以及贯穿整个集市的分布式文化流线。见图2。

结合区位、与周边建成环境的关系及自身功能，将新时期上海地摊3.0分为5类：位于商圈、周边餐饮和购物设施较多的配套商业型集市，周边住宅区聚集、生活服务设施较多的社区型集市，位于科教文化和体育休闲设施聚集区、结合历史建筑改造或城市更新项目的文脉传承型集市，周边公司企业聚集、主要为办公人群和创意产业人群服务的文化创意型集市，以及主要位于郊区、具有自然或其他资源优势的资源特色型集市。

表2 上海地摊3.0基本信息统计表

Tab.2 Statistics of temporary street market 3.0 in Shanghai

序号	集市名称	市辖区	地址	序号	集市名称	市辖区	地址
1	安义夜巷	静安区	静安嘉里中心安义路	29	彩虹嗨市	浦东新区	LCM置汇旭辉广场
2	思南夜派对	黄浦区	思南公馆	30	创智汇好涩花笙集市	杨浦区	创智汇广场
3	品进博 逛国展 赏灯会	青浦区	国家会展中心	31	浦江风尚节集市	杨浦区	东方渔人码头
4	老字号国潮游园会	黄浦区	豫园	32	泰晤士小镇集市	松江区	三新北路900弄
5	美酒集市	虹口区	1933老场坊	33	嗨淘夜市	虹口区	北外滩金茂时尚生活中心
6	外滩枫泾	黄浦区	BFC外滩金融中心枫泾路	34	永平里康民夜市	徐汇区	永平里
7	敢集	静安区	兴业太古汇、吴江路+多功能厅	35	滨江世茂市集	浦东新区	浦城路680号
8	创享塔网红美食夜市	普陀区	叶家宅路100号	36	华润时代广场潮流集市	浦东新区	华润时代广场
9	Hi! Fun集市	长宁区	虹桥南丰城丰尚街	37	大拇指广场集市	浦东新区	芳甸路199弄
10	六合IN巷	黄浦区	六合路	38	智慧湾集市	宝山区	智慧湾
11	听涛集市	奉贤区	海湾镇、五四公路1256号	39	乐享生活 悦夜角里	青浦区	中南朱里雅集
12	青春生活节	黄浦区	百联TX淮海渔阳里	40	仲夏纳凉童趣集	虹口区	瑞虹天地
13	外滩源集	黄浦区	圆明园路步行街	41	消费扶贫集市	金山区	金山万达
14	锦江乐园夜市	闵行区	锦江乐园	42	夏至音乐日集市	杨浦区	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15	花园夜坊	虹口区	花园坊节能环保产业园	43	ART TONE东岸上海生活节	浦东新区	老白渡滨江和艺仓水岸廊桥
16	后备箱集市	杨浦区	锦嘉路成嘉广场	44	匠心集市	静安区	大悦城
17	创智天地广场集市	杨浦区	创智天地广场	45	金山嘴渔村夜市	金山区	嘴渔村夜市
18	天地创市集	杨浦区	大学路缤纷广场	46	光影夜音节	虹口区	上海音乐谷
19	世纪汇广场	浦东新区	世纪汇广场	47	上海芒果HUB	徐汇区	天钥桥路123号
20	KiNG88市集	长宁区	KiNG88户外广场	48	爱琴海 潮玩夜巷	闵行区	爱琴海购物公园
21	爱企谷夜市	奉贤区	平庄西路3358弄爱企谷内	49	新业坊集市	宝山区	新业坊创意园
22	"疯狂HIGH TEA" HOW 集市	闵行区	中庚漫游城	50	宝山万达集市	宝山区	一二八纪念路968号万达广场
23	REAL ONE 会玩集市	普陀区	近铁城市广场B2下沉式广场	51	非遗购物节	宝山区	同济路669号宝杨宝龙广场
24	平凉路夜市	杨浦区	百联滨江购物中心	52	罗店古镇集市	宝山区	罗店古镇
25	百联金山周末夜市	金山区	百联金山购物中心	53	塘湾村农家集市	宝山区	罗泾塘湾村
26	糖人街甜蜜市集	静安区	久光步行街	54	凡几集市	黄浦区	复兴中路597号上海文化广场
27	"HOW 涩" 主题集市	静安区	静安大融城	55	万创潮汇集	杨浦区	五角场万达广场
28	西云楼潮流集市	嘉定区	西云楼				

2.2 地摊3.0与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

空间处于不断的塑造和变化过程中，是城市构建过程的展现^[11]。地摊3.0相关主体生长在具有特定特征的城市空间中，并对原有空间产生影响和场所转化。本文主要以讨论活动、空间和城市活力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为基础，将雅各布斯^[12]提出城市多样性的条件中“用途混合、有多样的功能和人群”，怀特^[13]认为运转良好的小城市空间“有小摊贩出售商品、容纳各类人群”，汉斯曼^[14]提出空间塑造特征中的“强度”（intensities）和“多重性”（multiplicity），卡莫纳等^[15]提到的“社会和功能维度”，以及森德拉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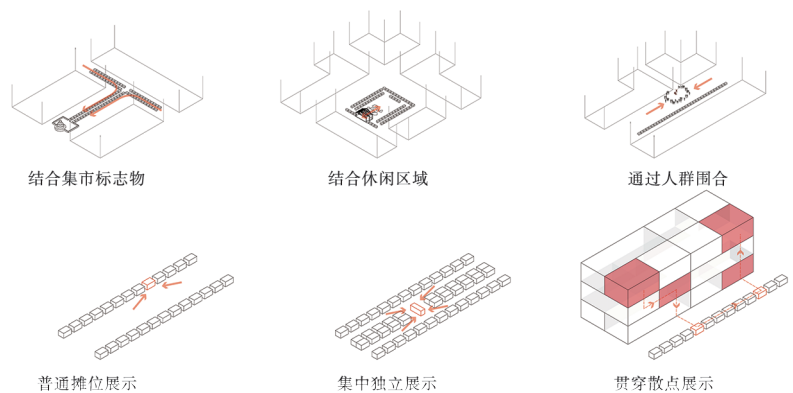


图2 集市艺术表演和文化教育空间类型

Fig.2 Types of art performance space and cultural education space in the markets

等^[16]调的“创造事件”和“非线性过程”，总结为功能关系维度。将“小街区”和“足够的密度”^[12]、“人们相互拥挤”和“能停留休息”特征^[13]、“连接性”（connectivity）^[14]和“形态和视觉维度”^[15]、以及“表面和剖面”的“选择渗透性”^[16]总结为空间关系维度。将“不同年代和状况的建筑”条件^[12]和“有阳光、风、树、水和音乐、表演等外部刺激形成‘三角效应’”^[13]，“去中心化”（decentralisation）、“协商性”（negotiation）特征^[14]和“认识、时间维度”^[15]，以及“开放的系统”和“需要提供原始设计策略和持续不断的更新”^[16]总结为制度关系维度。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表3）以及我国非正规经济与相关政策的相互影响和发展，提出地摊3.0和城市空间的功能—空间—制度相互作用理论模型（图3），研究地摊3.0与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机制。

城市空间和非正规经济的功能关系是基础，二者相互作用带来可持续的城市事件，促进功能混合和社会融合；空间关系是促进城市空间高效利用和非正规经济持续生长的重要支撑；制度关系为城市空间和非正规经济的互动制定游戏规则，综合考虑国际形势、经济环境、文化传承和环境卫生等背景，为二者的健康运转提供保障。空间关系为功能关系提供多样、适宜的实体支撑，社会关系为空间提供事件、更新机遇，制度关系影响空间的改造方式和社会活动的运行方式，空间关系和社会关系影响制度的形成。三者相互促进和制约，从而形

成具有包容性、有活力的城市。

3 上海地摊3.0和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机制实证研究

3.1 功能关系

（1）地摊3.0与周边功能关系的宏观特征

足够的功能密度是人与人产生交往互动从而达到足够的人的密度的条件之一^[11]，也是对不同类型人群容纳度高的体现，首先研究地摊3.0与周边各类功能的关系。根据托布勒地理学第一定律，周边建成环境数据属于空间数据，单从数量上研究忽略了空间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局部G统计量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各类功能聚集的冷点和热点区域，将其与集市分布的空间位置进行比较（图4），可以发现配套商业型集市基本在餐饮和购物的高值聚集区，上海市中心城区及部分郊区的集市位于住宿服务、生活服务的高值聚集区，在产业社区的集市大部分都位于公司企业分布的高值聚集区等特征。几乎所有集市都不在各类功能的低值聚集区内，说明选择开展集市的周边都有较为丰富的功能。高值聚集区本质是以经济和社会活动为动力而形成的“社会空间”^[15]框架，支撑着包括地摊3.0在内的各类城市活动出现和发展。另外，在多种功能的高值聚集区，赋予了集市多重性质共存，体现空间塑造的“多重性”特征^[14]，推动不同空间位置的地摊3.0朝不同功能和特征生长和变化。

以位于餐饮购物与科教文化高值聚集区的圆明园路集市为例，其功能与周边业态形成差异化互补的关系。外滩源业态以高端奢侈品和高级餐饮为主，周边虎丘路、北京东路业态以文化类和日常餐饮类为主；圆明园路集市业态以文创商品、服饰和特色小吃为主，并有艺术家表演、结合历史建筑的展览和立面投影、节日主题活动等功能，使圆明园路成为不同消费水平的游客、居民、办公人员等发生互动的关键区域。见图5。

（2）地摊3.0与周边业态和城市功能的相互作用

一个具有活力的城市环境之所以需要保持足够的多元性和混合性，是因为只有差异互补的城市功能才能达成有效链接^[11]。地摊3.0售卖商品类型和周边业态种类主要形成了差异化互补和同质共赢两种类型。集市提供与原有业态不同的商品售卖和活动体验，为原使用人群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同时满足更广阔人群的需求，与周边业态形成差异化互补的关系，如文化创意型圆明园路集市和文脉传承型思南公馆集市。集市提供与原有业态类似的商品售卖，通过集市的事件塑造，形成城市名片，增加地区消费，与周边业态形成同质共赢的关系，如社区型大学路缤纷广场集市和商业配套型外滩枫泾集市。

地摊3.0大多位于不同城市功能相交的“边缘”区域，此类公共空间由于地摊3.0而具有细胞壁的分隔功能，同时对部分功能和交往活动也具有渗透和融合

表3 行动者网络理论

Tab.3 Actor—network—theory, ANT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 ANT)	
核心内容	行动者:包含人类和非人类主体,后者不再只受人类支配或为人类服务,同样也具有能动性 and 权利 ^[17]
	网络:强调进行中的流动、变化和相互作用过程,是互动过程的流网(worknet),而不是完成时的网络(network) ^[18]
	转译:联系的产生是通过行动者的行为,将信息的含义、权力、关系进行改变,从而构建联系(translation)
与城乡规划的联系	行动者网络理论全面展现多元主体网络结构的互动关系,与城乡规划综合处理社会与经济、物质空间的相互关系不谋而合;更多关注不断生长和变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结果 ^[19] ,从而揭示表象后深层的相互作用和运行机制;将时代背景、空间要素、技术等都视为产生行为和影响的源头而不只是受支配者,从而能更好地嵌入我国新时期的具体社会空间场域。因此,将其运用在新时期地摊3.0和公共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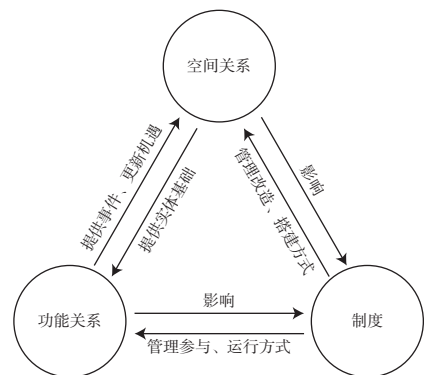


图3 地摊3.0活动和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模型

Fig.3 Functional—spatial—institutional model that illustra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ctivities of temporary street market 3.0 and urban sp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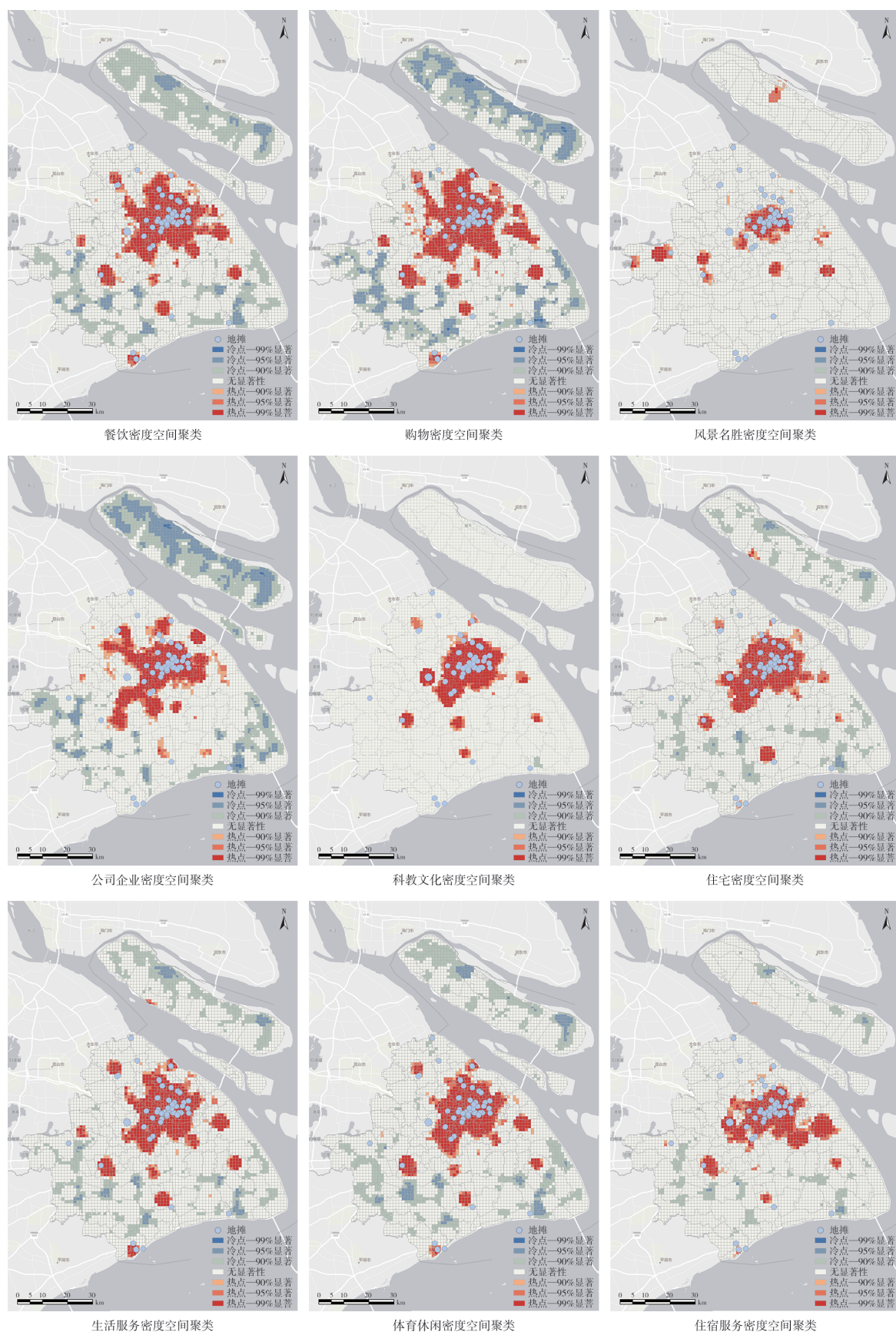


图4 各类功能密度高值低值聚集区与集市的空间位置关系图

Fig.4 Map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arket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functions

作用。六合路是商场功能和城市公共空间的边界，也是南京东路城市级娱乐休闲空间和传统里弄社区的分隔，六合集市是商场售卖功能的外溢，游客被引导向北部腹地空间，亲民商品的补充也吸引了里弄居民参与。外滩枫泾集市位于BFC外滩金融中心办公楼和外部广场的边界，也是金融中心、东北侧滨水公园和西南侧里弄的相交区域，集市举办时吸引办公人群停留、里弄居民活动往东延伸、公园游客向西侧引导（图6）。地摊3.0使各类功能不是在边缘结束，而是成为功能融合、人群互动、产生活力的源头。

3.2 空间关系

3.2.1 地摊3.0与周边空间肌理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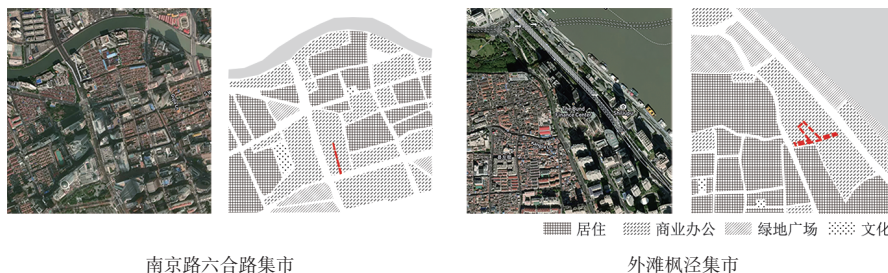
地摊3.0主要从作为城市肌理的黏合剂和增加城市空间的分形叠合层次两方面，与周边城市空间相互作用。集市在点式肌理外部，将点式建筑与周边空间进行黏合，增加街道等公共空间的围合性，促进活动的链接。当城市中的元素具有不成比例的尺度时，城市用途的多样性就会成为问题^[12]，集市在大型购物中心等点式肌理内部，形成更细一级空间的分形叠合，从而使城市肌理更为有效地连接（图7）。同时，地摊3.0利用作为重要建筑附属空间或后勤通行的消极

“过程性”空间，通过事件赋予、功能延伸而增加空间的连续性，将其转变为吸引人们停留并激发交往的场所^[20]，成为不断生长的开放系统。如位于点式和围合式肌理旁的“底”空间的圆明园路集市，外滩源33号大面积绿化使其周边肌理断裂，东侧半岛酒店侧门和少量橱窗的建筑立面使人行界面较为消极。圆明园路集市中的临时构筑物将现有肌理进行修补和有机连接，激发城市环境中的

行为活力^[14]。

3.2.2 地摊3.0与城市密度的关系

地摊3.0与城市开发强度和活动强度的关系可分为两类：位于开发强度高的区域，主要位于城市级商圈，人流量大，有利于地摊3.0发展；位于开发强度相对较低但社会活动强度较高的区域，包括腹地商业办公楼或大型高层居住区的城市街道或附属广场，以及历史和特殊功能因素带来较低开发强度和较高社会



南京路六合路集市

外滩枫泾集市

图6 集市周边区域卫星图和功能分析图

Fig.6 Satellite map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for surrounding areas of the mark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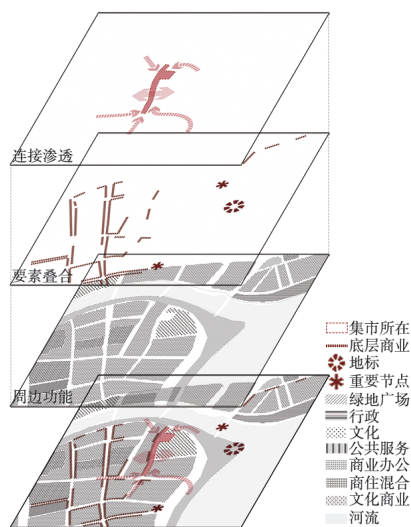


图5 圆明园路集市与周边功能关系分析图

Fig.5 Mapping of functional interaction of Yuanmingyuan Road Market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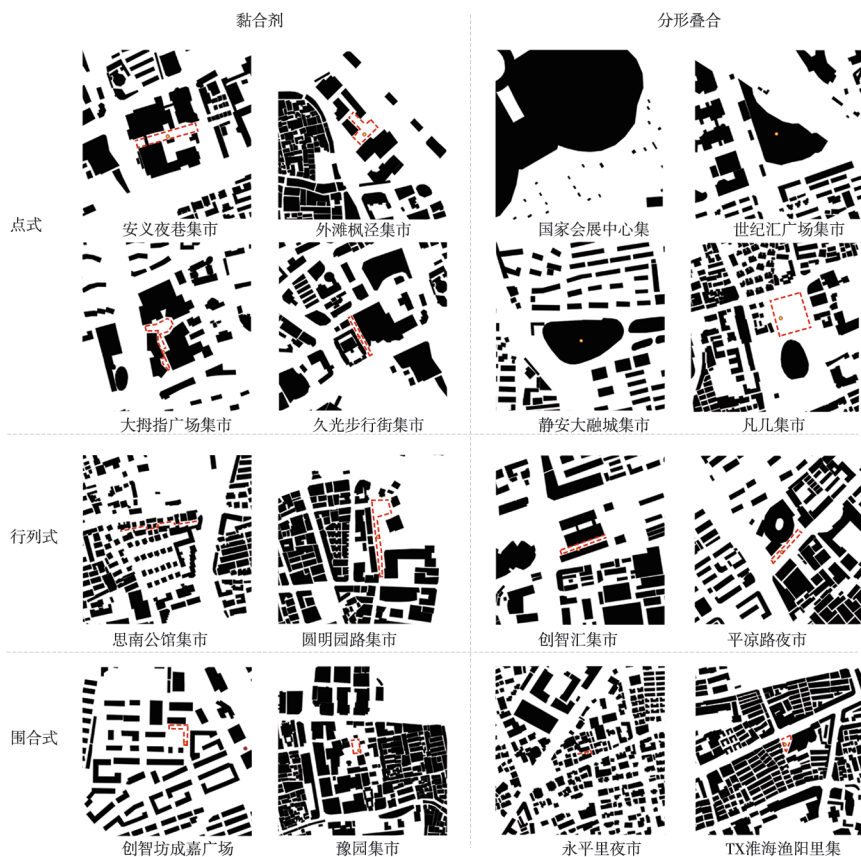


图7 地摊3.0和周边空间图底关系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orary street market 3.0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图8 圆明园路集市对空间肌理的连接

Fig.8 Connection the local urban fabrics by Yuanmingyuan Road Market

活动强度两种情况，如外滩源集市和东岸滨江艺仓集市等。见图9。

大部分地摊3.0位于道路交叉点密度高的区域，高交叉点密度有利于城市中两点之间的联系，从而增加交往的可能性。少数地摊3.0位于低道路交叉点密度区（图10），包括周边为大型地产开发项目、位于滨江和中心城区外等3种情况，如瑞虹天地集市、北外滩金茂集市和奉贤爱企古集市等。由于其本身具备人流基础、空间和资源特征、历史文脉而使其具有较大吸引力，因此也有利于地摊3.0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

3.2.3 地摊3.0与周边空间组构的关系

在空间句法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设计网络分析（sDNA）^[21]工具，选择反映社会网络“中心性”的度量值穿行度（betweenness），对道路的步行出行潜力进行度量^[10]。中央活动区范围内大部分集市道路的步行出行潜力较高，但滨江的部分集市、郊区社区中心的集市和郊区特色景区集市步行出行潜力较低，如东方渔人码头集市等（图11）。较高出行潜力的空间组构提供更多被穿行和发生活动的可能性，而滨江区位带来的景观资源、郊区社区级中心的高出行潜力、特色景区吸引力也提供了适宜地摊3.0发展的空间特征。作为触媒的地摊3.0吸引更多类型的人群提供更多样的交往活动，激活各类具有不同特征的公共空间。

3.3 制度关系

从规划的角度来讲，活力的背后核心是制度^[22]。运转良好的制度关系，需要社会和空间对多元人群和活动容纳度高的同时，从城市的黏滞力的视角出发^[23]，关注非人类主体，强调每个行动者对社会协调运行所作出的贡献，能吸

集市周边开发强度栅格图 现状卫星图（2020年） 集市周边开发强度栅格图 现状卫星图（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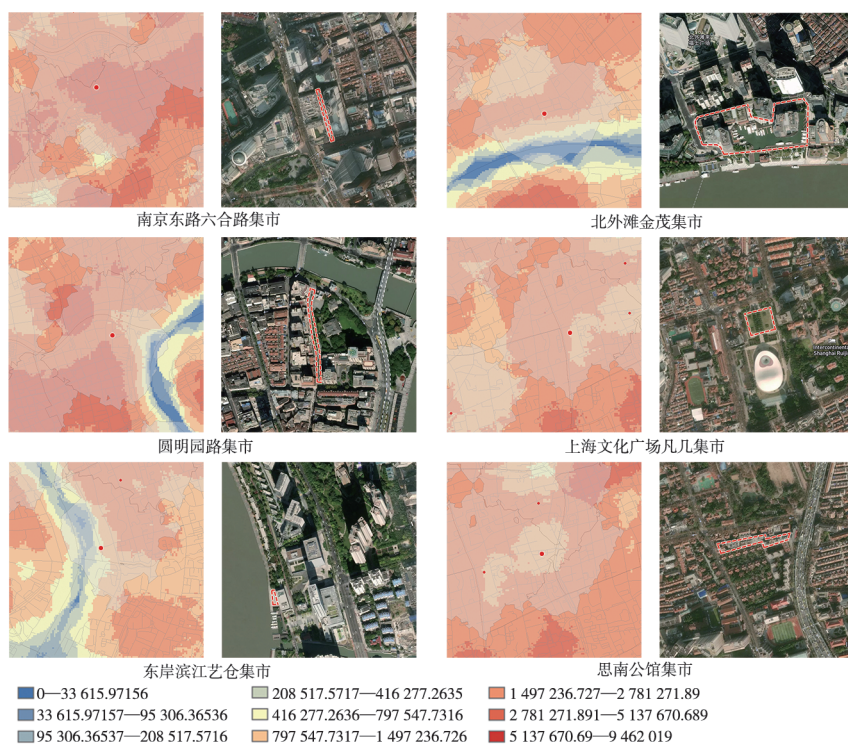


图9 上、中、下分别为位于开发强度高区域的集市、位于开发强度相对较低而腹地开发强度较高区域的集市、位于开发强度较低而社会活动强度较高区域的集市

Fig.9 Markets in areas of high development density, markets in areas of relatively low development density but surrounded by high-density areas, and markets in areas of low development density but intense social activity

引如地摊3.0等有利于空间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社会行为。

3.3.1 疫情前的社会活动环境

在国家注重城市环境的背景下，很多城市在环境整治方面取得成效，但也产生公共空间活力降低等问题。政府具有核心行动者的地位，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其他人类行动者包括非正规经济销售者、居民等，非人类行动者包括政策、围墙、街道等。

非正规经济销售者在销售过程中获得收益，但其占据街道等公共空间、影响周边店铺的收益。部分居民由于价格低廉和便利性高等因素，对非正规经济的需求较大；而其他居民受聚集人群产生噪声、交通拥堵问题的影响，利益受损。城市空间活力因人群交往而提升，但人行道可通行宽度缩减、废弃物产生等消极因素导致公共空间品质降低。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对非正规经济进行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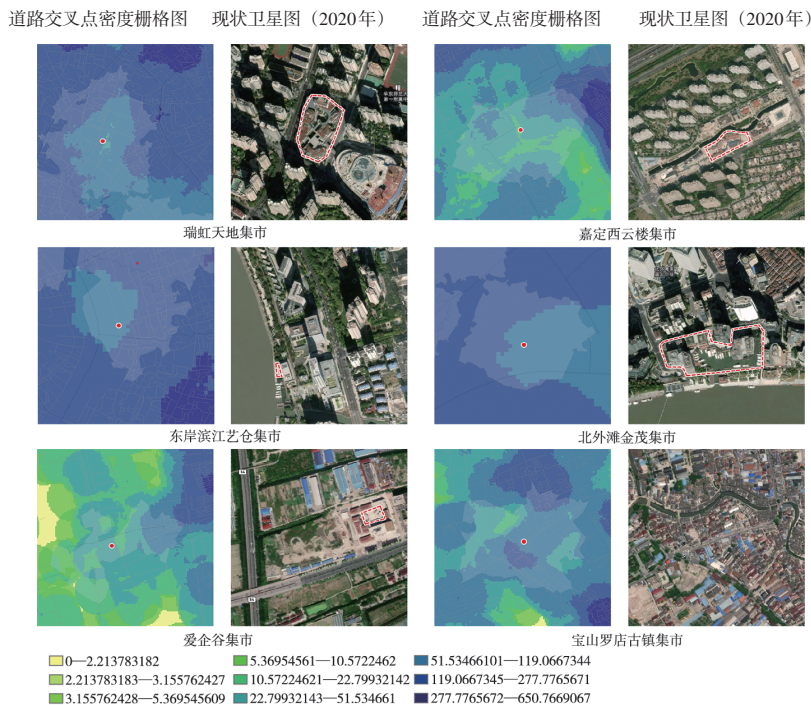


图10 位于交叉点密度低的区域的三类集市

Fig.10 Three categories of markets in areas of low road intersection density



图11 集市所在区域道路出行潜力分析

Fig.11 Analysis of road mobility potential for areas surrounding the markets

和限制：住宅楼沿街店铺被强制性拆除，留下只有通行行为的街道；流动摊贩被禁止，人行道恢复宽敞有序却无法吸引人群停留和活动。见图12。

3.3.2 疫情后的社会活动环境变化

疫情后经济和社会活力降低，政府调整政策不再完全禁止非正规经济，甚至使其成为解决问题的策略。地摊3.0出现并成为核心行动者，人类行动者增加了艺术家、集市公司等，非人类行动者增加了绿地、历史建筑、文化艺术等。行动者原有行为方式被重新定位^[24]。在多方协调、矛盾处理的过程中形成了涉及集市公司、政府部门、场地提供方和摊主群体的运行和管理机制，4类主体相互合作、制约，促进地摊3.0的进行和经济活力的恢复。见图13。

地摊3.0对各类行动者进行征召，行动者的日常行为与自上而下的战略需求达到平衡，社会和空间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增加（图14）。以圆明园路集市为例，集市公司与外滩源开发及经营公司协商，向黄浦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派出所和消防部门等报备并获得批准后，通过网络、招牌宣传招募合适的摊主，负责运营集市活动全程。工作日，圆明园路本身是该区域“整洁风貌展示”和“通行”活动的核心行动者。周末，地摊3.0成为核心行动者，“一种重新联结与重新组合的特殊运动”^[18]展现出来。圆明园路提供空间，居民、游客将其视为通行之外的交往场所，与摊主、艺术家发生互动；集市为艺术家提供展示舞台，艺术家为集市吸引更多人流，并促进艺术文化传播；历史建筑立面作为舞台背景，而集市也促进其文脉传承；围墙和行道树提供多样化的展示空间和分隔功能，阳光带来更多人流，并发挥行道树遮阳、倚靠的作用；实体店铺与集市共享外摆空间，集市为其带来更多客流。原有网络中被动关系转变为主动互利的相互作用，扩大并加强了社会关系网络。

4 地摊3.0和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对城市公共空间更新的启示

4.1 地摊3.0的价值

地摊3.0适应于在历史事件和社会关系作用下不断构建的空间，发挥了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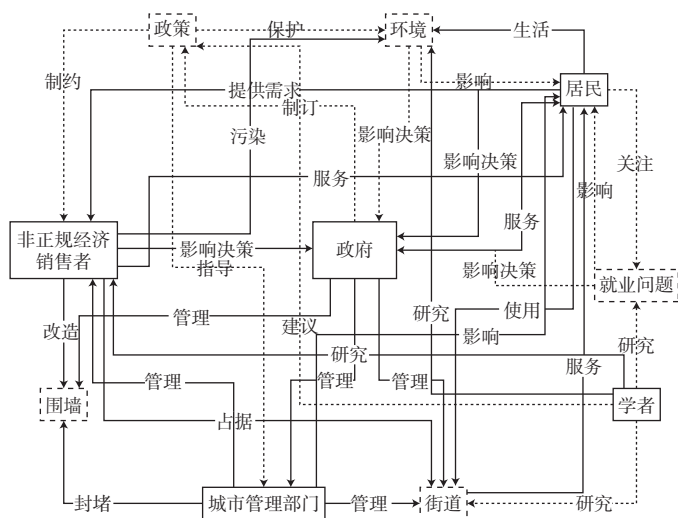


图 12 以政府为核心行动者的行动者网络

Fig.12 Actor-net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as the main ac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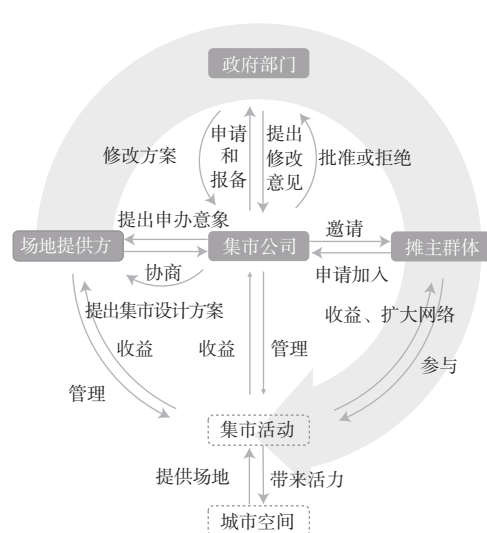


图 13 地摊 3.0 管理运行机制

Fig.13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system of temporary street market 3.0

历史记忆的社会价值；同时，其促进公共空间形成激发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特色风貌，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因此，当下具有“非正规”形式的地摊3.0并不是在“正规”的对立面，而是为“正规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功能关系方面,符合周边功能强度变化节奏的地摊3.0能够赋予城市边缘空间、消极空间社会功能,将其转化为具有选择渗透性的“细胞壁”,连接其腹地更大范围的空间和人群,从而激活整个区域。同时,集市业态和活动能够与周边业态形成差异化互补或同质共赢的关系,结合地摊、集市等非正规经济在历史上的社会意义,有利于形成享誉国家甚至国际的城市名片,提升城市影响力。空间关系方面,地摊3.0活动通过织补城市肌理带动公共空间更新,使其包容非正规经济形式及轻建设临时构筑物,形成具有弹性的开放系统,而不是一个完成的项目,从“附属空间”“后街”等“服务”其他“主角空间”的性质转变成成为城市活力的主要贡献者。制度关系方面,地摊3.0对形成具有针对性、更加完善的管理体系,以及对行动者观念的转变,对形成不断生长和发挥积极影响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作用,其使人类、空间、时间、新技术的交互网络形成并可持续发展,提升社会多样性和城市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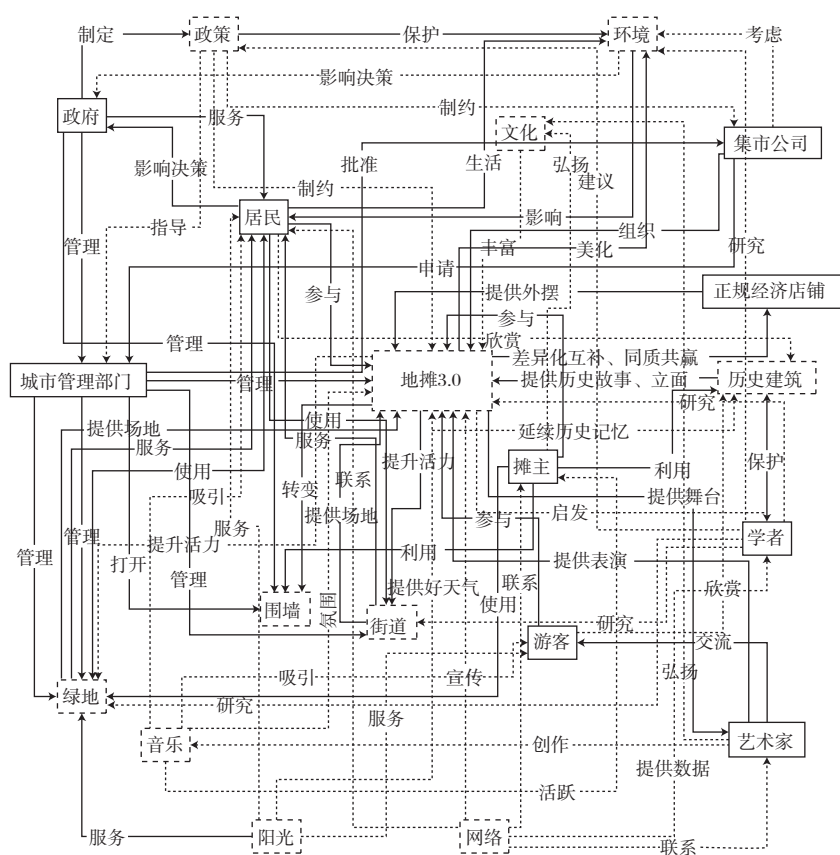


图 14 以地摊 3.0 为核心行动者的行动者网络

Fig.14 Actor-network with the temporary street market 3.0 as the main actor

4.2 地摊3.0影响力分类

地摊3.0与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了城市级、地区级和社区级等3个层次的影响力。城市级地摊3.0的服务人群涉及整个上海市甚至周边地区,在提供城市活动的同时,具有城市营销的作用,如圆明园路集市。地区级地摊3.0服务范围相对较小,主要位于城市副中心、地区中心,如南京路六合集市。这两级地摊3.0更多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社交和自我实现需求,对周边功能的融合渗透、空间肌理的连接和社会活动环境的提升优化有更为积极的影响,能够发挥传承历史记忆、塑造特色风貌和促进城市营销的作用。社区级地摊3.0更多满足居民日常基本需求和摊主谋生需求,对城市功能的补充完善有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日常生活和社会保障层面的基础设施体系。因此,3类不同影响力的地摊3.0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促进包容性社会的塑造和城市活力的提升,为上海构建人性化的国际大都市作出贡献。

结合地摊3.0的主要类型和影响力,形成类型工具箱。横坐标为5个集市类型,纵坐标为3个层次的影响力,为政府和设计师提供管理地摊3.0和公共空间更新的基础支撑。见图15。

4.3 基于地摊3.0的公共空间更新策略

4.3.1 功能关系

公共空间的更新应从塑造平衡和融合日常生活和城市战略的事件体系角度出发,与日常生活结合创造触媒,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社会活动动力体系,从而激活公共空间,通过流动空间拓展地方空间。结合地摊3.0分级分类,适宜社区级集市的公共空间应主要考虑与现有城市功能形成差异化互补的关系,提供便民服务。适宜地区级集市的公共空间,在与周边业态形成差异化互补或同质共赢关系的基础上,发挥渗透城市功能、将“边缘”空间转化为不同人群和功能交会空间的作用。适宜城市级集市的公共空间,首先应挖掘所在城市空间的场所精神,切实考虑公共空间及周边功能相关行动者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提升各类行动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符合现有功能强度变化节奏的基础上,引入旗

舰店等头部企业,吸引更多人群,打造城市名片。

4.3.2 空间关系

公共空间的更新应关注城市肌理的缝合,与周边建筑空间形态、开发强度、道路交叉点密度、道路出行潜力等空间特征相适应,塑造具有适宜尺度和密度的公共空间,增强行为链接。针对适宜社区级集市的公共空间,应发挥其作为黏合剂的功能,织补城市肌理,并针对5类不同特征的集市提供差异化的空间形式,促进其最大效率发挥提升经济和社会活力的作用。针对适宜地区级集市的公共空间,通过分形叠合等方式,将城市功能在更细尺度上进行组织,转变“过程性”空间内涵,吸引不同群体并发挥其能动性,促进当下和更长远的时间和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生长。针对适宜城市级集市的公共空间,增加与地标、重要历史建筑等典型行动者结合形成展现文化内涵的标志或活动事件,融入新科技、网络等增强空间塑造过程中的互动性和辐射性,形成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交互系统,联系更多元行业人群和非人类行动者,建立社会文化载体体系,使交往活动和空间更新更加稳定可持续。

设计理念上,应将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景观中一个可持续元素。城市景观具有原始、自然、永恒的特征:首先,应使公共空间具有真正公共性的原始属性,每个行动者在其中能够自由地与空间对

话。其次,公共空间处于建筑与自然环境的交界区域,更接近自然的原生性,应充分发挥其开放与平等性,使各类空间都能成为承载最初规划功能以外的发挥自然、经济、社会价值的主角。最后,应使公共空间成为连接历史、技术、场所和文化的媒介和没有空间和时间边界的舞台,人、城市、文化互动,不断承载更多的可能性。

4.3.3 制度关系

公共空间的更新也应从提供促进其发挥社会和经济效能的制度角度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完善政策制定、执行、管理体系和合作体系。见图16。

首先,应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信息可获取性,针对不同层次的集市,需要根据城市特征、历史文化、人群分布、开发和活动强度等因素,对具体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和完善补充,并通过政府官方渠道明确申请程序。如适当给予城市级集市更高自由度,提供特殊政策,促进其对城市影响力的贡献。其次,应从充分发挥各类行动者创造力视角出发,促进多方参与的包容性社会环境形成。重视行动者在不同社会背景和互动过程中的角色转换,关注权力在不断互动构建的网络中的重新赋予。另外,执行政策和措施时需要加强政府不同部门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不同政策之间进行相互补充和支持,形成完善可操作的政策体系,如《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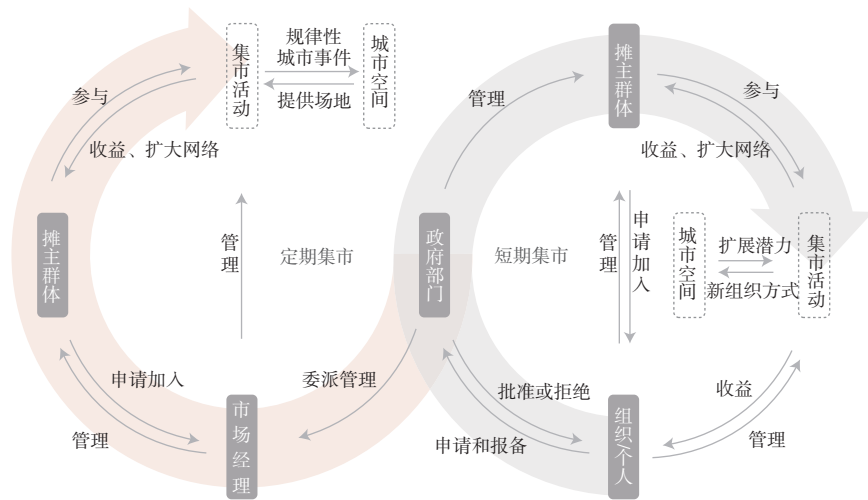


图15 地摊3.0分级分类

Fig.15 Category matrix of temporary street market 3.0



图 16 完善管理体系和合作体系

Fig.16 Enhancing the management and the cooperation system

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可落实到《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补充具体措施，并在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等政府和学者合作的实验项目中实践。

参考文献

- [1] TONKISS F. Cities by design: the social life of urban form[M]. John Wiley & Sons, 2014.
- [2] 童明, 王澍, 王世福, 等. “高品质公共空间的协同营造机制”学术笔谈[J]. 城市规划学刊, 2021(1): 1-9.
- [3] 徐苗, 陈宇琳, 玛莎·陈. 非正规经济下的城市空间发展: 全球趋势与地方规划应对[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 34(2): 1-6.
- [4] WU F L, ZHANG F Z, WEBSTER C. Inform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demolition of urban villages in the Chinese peri-urban area[J]. Urban Studies, 2013, 50(10): 1919-1934.
- [5] 王伟强, CHUNGU G. 非正规经济活动对城市中心区的影响[J]. 城市规划汇刊, 2001(6): 52-57.
- [6] 伍江, 段进, 张京祥, 等. “城市精细化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学术笔谈[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2): 1-11.
- [7] 张磊. 流动摊贩类型及其经营规律研究: 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J]. 城市问题, 2013(5): 72-76.
- [8] 闫海波, 陈敬良, 孟媛. 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形成机理研究: 理论、实证与政策框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8): 81-89.
- [9] 梁雪媚. 居民视角下城市街道商业空间整治的影响及策略研究: 基于上海五个案例的探讨[D]. 同济大学, 2020.
- [10] ZHANG L, CHIARADIA A, ZHUANG Y. A Configurational accessibility study of road and metro network in Shanghai, China[M]//PAN Q, CAO J.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urban planning: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8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a planning conference, Guangzhou, China, June 21 - 22, 2014.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219-245.
- [11] 童明. 城市肌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J]. 城市规划学刊, 2014(3): 85-96.
- [12] 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译林出版社, 2006.
- [13] WHYTE W H.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M]. 8th ed. New York, NY: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2001.
- [14] HANSMANN S. Monospace and multi-verse: exploring space with actor-network-theory[M]. transcript Verlag, 2021.
- [15] 卡莫纳, 迪斯迪尔, 希斯蒂姆, 等. 公共空间与城市空间[M]. 马航, 张昌娟, 刘堃, 等,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 [16] SENDRA P, SENNETT R. Designing disorder: experiments and disruptions in the city[M]. Verso Books, 2020.
- [17] 李雪垠, 刘鹏. 从空间之网到时间之网: 拉图尔本体论思想的内在转变[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 25(7): 52-56.
- [18] 吴莹, 卢雨霞, 陈家建, 等. 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 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 行动者网络理论》[J]. 社会学研究, 2008(2): 218-234.
- [19] 孙施文, 周宇. 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J]/OL. 城市规划学刊, 2015(1): 39-45.
- [20] SENDRA P. Infrastructures for disorder. applying sennett's notion of disorder to the public space of social housing neighbourhoods[J].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6, 21(3): 335-352.
- [21] COOPER C H V, CHIARADIA A J F. sDNA: 3-d spatial network analysis for GIS, CAD, command line & python[J]/OL. SoftwareX, 2020, 12: 100525.
- [22] 孙施文, 武廷海, 王富海, 等. 活力城乡 美好人居[J]. 城市规划, 2020, 44(1): 92-98.
- [23] 王伟强, 王孟永. 双重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的作用力机制探讨[J]. 上海城市规划, 2010(1): 3-8.
- [24] YANEVA A, MOMMERSTEEG B. How does an ANT approach help us re-think the notion of site? [M]//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Routledge, 2019.

修回: 2023-05